运河文化

梨园行说:水路即戏路。这话真不假。大运河上,南来北往的漕运船只上,曾有多少戏子艺人搭船去向自己的舞台,运河上大小码头,又有多少大角名伶留下自己醉人的演艺。运河山东段大码头临清,有“繁华压两京”、“富庶甲齐郡”之称,是过往戏曲名角大腕们争相献艺的地方,也曾经是山东戏曲的重要策源地之一。

水路即是演戏路 花鼓号子也关情

□马永

柳林花鼓。(资料片)

临清,弦索温床,京剧重镇

临清,一直是戏曲重镇,它对山东戏曲的贡献,在于临清是弦索系统声腔的重要发源地之一,也是弦索声腔向着更远地流布的集散地。临清的田庄,旧属清平县治,据《重修清平县志》载:清平有吹腔,声韵悠扬,颇饶古致。这里所说的弦索声腔,其中就包括今天仍然存在的古老剧种柳子戏。实际上,清平田庄代代相传的吹腔,就是柳子戏的临清分支。

因为临清是运河上的重要码头,无论是艺人进京寻求发展,还是大腕名伶出京巡演,或是无法适应京城激烈的竞争、败走他乡的落魄艺人,在中国未通火车之前,京杭大运河总是他们首选的通路。到了临清,他们常要登岸,一来献艺,挣些盘费,二来拜拜这百年的梨园行大码头,沾些灵气。

临清这个京剧大码头,来过的艺人多,名角多,演过的戏也多。但是,很长时间里,都没有留下一个有名气的戏班子,这一直是临清的遗憾。

直到1949年,临清有了第一个京剧团。这个京剧团,前身是一直活动于冀鲁豫边区的“民生剧社”。当时主要演员有李和曾、李忆兰等,擅演《借东风》、《逍遥津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等剧目。解放后,这个剧社改称“临清市前进京剧团”,又整理演出了《扫松下书》、《打渔杀家》、《绣襦记》和连台本戏《呼延庆打擂》等剧目,1958年改称“临清市京剧团”,1965年排演《赤道战喜》时,袁世海、杜近芳等京剧大家特地来临清观摩指导。梅派名角杜近芳、裘派名角袁世海来了,必是要登台献艺,一时传为佳话。1969年,以临清京剧团为主,合并了大笛子戏演员和原聊城县文工团的部分演员,组成“聊城地区京剧团”,先后排演过《飞云崮》、《乌三娘》、《徐策跑城》、《战铜台》、《走麦城》、《四进士》等剧目,这个京剧团曾在全国名噪一时,全国四十多个文艺团体都来学习取经。1995年,该团还创作排演了现代戏《孔繁森》。

也许是京剧大腕名角光临留下的种子,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京剧团创下的氛围,或是长长的运河水给临清养成的文化基因,临清人爱京剧,懂京剧,如今运河畔的公园里,每天都有很多戏迷票友,唱上几段京剧,自娱自乐。

柳林花鼓,娱神之舞更娱人

流行于聊城冠县的柳林花鼓,最初是临清碧霞宫庙会的重要的娱神表演项目。

与一般的花鼓秧歌不同的是,柳林花鼓很有“故事性”。花鼓的表演内容是《水浒传》故事中重要的一折,讲的是:河北大名府卢俊义为奸人所害,即将问斩,宋江、吴用等梁山好汉化妆成花鼓艺人混进大名府,劫法场救下卢俊义。据说,秧歌表现这段故事共有两个部分,第一个部分是讲梁山好汉化妆进城、一路上边歌边舞的情形;第二部分表现劫法场大闹大名府,救出卢俊义的战斗场面。可惜,现在保存下来的,只有第一部分,第二部分已经失传。表演道具除花鼓之外,还有伞、锣、鞭,表演重视技巧,看上去甚至很像武术表演。

柳林花鼓表现内容固定,秧歌队的阵容也是固定的人员组成,看起来很有意思,热闹非常,却与《水浒传》的原来内容有很大出入,乍一看,甚至让人有点“看不懂”。秧歌队组成人员总是不变:伞头是吴用,刘唐、李俊是头鼓,柴进、花荣是二鼓,孙二娘、扈三娘是头锣,顾大嫂、乐大娘子是二锣,武松、鲁智深被称为两个“和尚”,宋江被称为“老鞑子”。

柳林花鼓被称为“文武秧歌”,因为舞秧歌的称“武场”,他们只舞不唱,还有一队“文场”,他们只唱不舞。有意思的是,柳林花鼓的演唱内容和“大名府救卢俊义”无关,曲调也比较庞杂,演唱的有《绣帐幔》、《好一朵奴女花》、《喜歌》、《河南有个王员外》等几段。

柳林花鼓文场唱腔被称为“九腔十八调,七十二哼哼”,有柳林独特的韵味,实际上,这与弦索系统戏曲声腔也很契合。

武城船工号子,力与美的歌

运河里行船,不比在大江大河大湖,能借助的风势有限,水流有急有缓,上下行船,还有顺水逆水之分,行船常有困难,这就要用到一种苦力的差事——纤夫,也叫船工。一队船工在岸上拉纤,心齐才能聚力,劳动号子就成为协调步伐的必需。

武城,有近百个村庄临运河,是运河船工号子重要的发祥地之一。当年,很多穷苦的人家,世代都做船工,那船工号子也就在他们的心中、口中,代代相传。

风物 fengwu

船工号子,是劳动的号令,也是船工心中的呐喊,被艺术地称为“水边的歌”。武城船工号子,不仅协调船工拉纤时的步调一致,还分别有打篷(升帆)、起锚、拉纤(行船)、拉冲、撑篙、摇橹、绞关、警戒、联络等不同的类别,吼唱起来,特别讲究力度和节奏,词句凝练,曲调充满感情,表现出船工们不畏艰险、战胜困难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。

【怀念】

母亲走后的春天

□赵德发

这个春天如期而至。立春之后是雨水,雨水之后是惊蛰,惊蛰之后是春分、清明……

然而,在我的感觉里,这个春天大不一样,春风吹到脸上是暖的,但我心中寒意重重;春光进入眼里是美的,但我心中一片灰暗。

因为,在这个春天里,我没有了母亲。母亲是正月二十七走的。上午,我打电话给正在父母跟前值班的三弟,得知母亲病情突然加剧。那时三弟正坐在床上,一手抓手机,一手揽着母亲。就在我们兄弟俩通话的时候,母亲悄悄走了。

我和妻子连同在外地的几个弟弟妹妹急急忙忙往回赶。父亲见了我流泪道:“你妈走的时候,连个扑棱也没打……”

母亲是肥厚型心肌病患者,九年前卧床大半年,差一点没了。那时医生就告诉我,这种病人会是这样的结局。九年后果然应验,连挣扎几下都免了。

其实,母亲这一年来已经显出了迹象:身体越来越瘦,饭量越来越小。我知道,这就是所谓的风烛残年。

母亲也明白。她常说,“来年我就八十四了,到头了”。正月十五,母亲和我一起包饺子,一边干活一边说:八十四了,比你姥娘多活一年,比你两个姨多活十几年,也可以了。

母亲出殡时,有亲戚劝我:你不用伤心,老人家是寿终正寝。我年近花甲,且读过佛经,对于生死还是看得开的。然而,血缘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,强大到足以改变一个季节的属性。

我忍不住想,没有了母亲的春天,怎么能和以往的春天相同?

有母亲的春天,一个个在我大脑中重新显影——

54年前的那个春天,大饥荒让我和弟弟妹妹天天害饿,母亲绞尽脑汁为我们去找吃的。她到地里剜野菜,到山上采树叶,将花生皮磨碎了烙成煎饼,将菜园里还没结棒的玉米拔回来磨成糊糊给我们烙饼子。我想,如果没有母亲,病弱的我很难熬过那个岁月。

40年前的那个春天,父母为了给我盖新房,省吃俭用,日夜辛劳。

26年前的春天,得知我要考山东大学作家班,母亲满脸歉疚地对我说,当年眼光太短,初中还没念完,就早早让我下了学。她还找出三百块钱,硬塞给我,让我做学费。去年春天她生病住院,我赶去后她不说自己的病情,又说起这事,让我十分惊愕。我想,我这事,有她的生命重要吗?她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再提此事呢?

9年前的春天,母亲病重,让人扯孝布。

一个个的春天,母亲精心打理院子、种花,每年的香椿芽,都要分给儿女;山楂,一人一份。

去年春天,我陪母亲赶集,买了杜鹃花。临走,她都要在门外目送,说:“见一面就少一面了。”

母亲入土次日,我去给姥娘上坟。姥爷1948年牺牲在河南,姥娘的坟里只有她一个人的骨灰。此刻,姥娘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归西。在坟前,我在心里发问:姥娘,你见到我妈了吗?姥娘不答,墓碑默立。我回头看看三里外有我母亲新坟的东山,看看东山之上的茫茫云天,泪下千行。

送母亲火化,需带她的身份证和村里开的死亡证明信。证明信交上了,身份证却留在我的手中。家乡人认为,人死之后,魂还要在家里呆上五七三十五天。我想,旧时有人说,人有三魂六魄,那么,这个印有母亲头像的身份证,应该附有母亲的一缕灵魂。

我将身份证装入钱包,放到了离我心脏最近的地方。我走到哪,就带到哪。母亲随我回日照,还去济南开会,参加我的新书签售活动,去山东大学演讲。在这个春天里,我与母亲的灵魂同行。

阴历二月底,我回家伺候老父,一进院子,就见到了春的景象:山楂,香椿,花椒,木瓜,韭菜,菊花,月季……都在发芽。我还听到了它们的叹息——唉,你娘看不到俺们了,她不能伺候俺们了……

我想,在这个春意盎然的时刻,藏在我胸口的母亲,不知会有什么样的表情?

我不敢看,只将胸口紧紧捂着。

【忆海拾珠】

我给八位烈士写祭文

□赵玉玺

望着这座新落成的墓碑,38年前初建墓碑时,我含泪为烈士们写祭文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过去了多少个日日夜夜,虽然碑身几易其处、几换其面、祭文几易其稿,但今天想来,我是为这座墓碑写祭文的第一人。

在名相故里、铁匠之乡的章丘市相公庄镇七郎院村东,有一座刚建成不久的烈士墓碑,引来四邻八乡人们的瞻仰。碑体洁白无瑕用大理石砌成,碑面则用黑色大理石点缀,八个用草体刻成的金色大字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显得格外苍劲有力。它北离章丘八大景之一“黉塘岭”三里之距,东离唐朝宰相房玄龄的故乡只有千米之遥。

38年前,也就是1976年的春天,当时担任村主任的李宇阳同志找到我,要我给在村东南刚建立起的一座纪念碑写祭文。这是县民政局和庄人联合为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的八位烈士建造的,要为这八位烈士迁坟立传,并将他们的事迹刻石立碑供后人瞻仰。那年我26岁,在村里担任电影放映员。接受这一任务后,我感到责任重大,一连几天,我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十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,听他们讲述一个又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在济南战役打响的前日,受上级指派,我村设立后方医院一处。当时选择在七郎院村北头张家胡同张家祠堂,由于这里住家比较少,环境卫生也好,祠堂西边不远处是一条小河,为伤病员洗衣、洗被、洗绷带都比较方便。

济南战役打响的日子里,伤员一批批被送往这里包扎、治疗。由于医疗条件限制,救护人员主要是进行取弹头、弹片以及消毒、打破伤风针、缝合、扎绷带等。那些用担架从战场上抬来的伤病员,有的头部受伤,有的腹部中弹,有的失去了一条胳膊,有的失去了双腿……为了救护这些重伤员,救护队员黑夜白天轮流守护。虽经奋力救治,但因伤势较重、流血过多,还是有八名战士先后离开了我们。这八位烈士分别是:孙洪刚、李雪敏、范长庚、魏松、马中和、彭立锌、刘崇竹、刘池凉。

当时,上级民政部门组织村里数人,按当地村民的丧葬风俗,修墓穴、钉棺木,举行了隆重的丧葬仪式。安葬在我村北黉塘水库岸西,墓穴“一”字东西排列,坟丘与坟丘间两米相距。每个烈士的坟前立一墓碑,上写“革命先烈之墓”。

记得那年我去民政局查阅烈士档案材料,遇到县人武部赵发部长。他热情地和我握手,并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小伙子,咱这是做善事啊。革命先烈为咱打下天下,咱千万不能忘记他们。”紧接着向我讲述了他的亲身战斗经历;“我参加过济南战役、莱芜战役、淮海战役,共有二十多名爆破手听我指挥。在战役中,我曾目睹他们在执行任务时,被敌人的枪弹击中,再也没有回来。每失去一名战士,我都会难过好多天。”

时光如水,日月如梭。英雄离开我们已经六十六个春秋了。每当春暖花开的清明时节,人们都会到这里会集。四面八方学校的师生以及各界人士纷纷来到烈士墓前,向他们献花敬礼,以寄托人们对英雄的敬仰。每当我看到一群群为烈士扫墓的人,一遍又一遍地朗诵我给烈士碑上刻写下的祭文时,我的内心就又增添了一份对烈士的怀念。